

第一部分 战略和外交

1、未来的战略格局

道格拉斯·H·迪尔斯

“在新的千年，美国外交政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亨利·A·基辛格

新的安全思维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通讯、经济、能源、文化、人口等的变化，战略格局也将发生巨大变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将随着民族国家性质的变化而改变。对世界各国来说，一些至关重要的特性在许多方面在发生转变，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进程也相应地在发生变化。有鉴于此，不同民族、国家为各自利益将展开更加频繁的竞争与争夺。在某种意义上说，过去曾有助于创造财富与发展经济的一些因素，也将在这个时代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各个民族、国家挑起冲突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一成不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因一些新的力量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远距离毁伤能力的问世，冲突的地域将趋于缩小。变化中的人口分布方式也将改变民族与个体的认同

性。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全球化的时代。诚如此，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我们试图衡量和界定那些变化的性质、趋向、程度、影响和意义时，那些因国家安全责任而承担的义务将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审视那个世界。当我们试图了解我们在历史中的位置时，这将要求我们对一些基本假设提出疑问。新安全观需要新的思维模式：思想的新方式，处理周围事物的新方式，看问题的新方式，也许还有利用我们资源与成果的新方式。

战略格局的特征

正在变化着的战略格局的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全面战争与占领的终结

二十世纪是全面战争的世纪。追溯历史，全面战争概念其实是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式大规模战争思想的产物，即：为实现国家的抱负而进行全国总动员。对于美国来说，全面战争思想更直接来源于南北战争，从此以后，美国军队和人民在战争中一直奉行迫使对方“无条件投降”的理念。

但是，也许这一理念已使得我们对战争的战略目的不甚清楚。诚然，国际战争可以是为有限目的而进行，但如果是一国内部的内战，则似乎不大可能。仍以美国内战为例：当初南方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有限的，也就是要自行其事，但当北方为确保统一而不由分说地发动猛烈打击后，却最终演绎成一场为生存而战的全面战争。美国内战之所以成为一种范例，主要是因为它是大工业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范围至少波及了半个大洲，体现了自拿破仑时代即已初露端倪的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的方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技术和民族情绪都已走向失控，所以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从而背离了任何一个冲突挑起者的初衷。1914年，人们普遍预期战争将在数月内结束，战争双方都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占尽上风，对方将不得不求和，对国际体系将无需作出多大的调整，就像以往在欧洲国家间已持续数百年的征战中那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也是一场全面战争，但当时只有美国自始至终坚持“无条件投降”理念。在1943年2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当罗斯福总统就战争目标发表了单方面声明后，英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出现极大恐慌。虽然这一主张很快被丘吉尔首相所接受（不过其军事顾问们并不愿意），但假如1944年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行动获得成功，德国人提出了合理的条件，那么，能否坚持把无条件投降作为战争目标，就颇值得怀疑了。厌战的美国公众，特别是英国公众，面对德国提出的停战、撤军和废除国社党政权的条件，想必不会再支持继续战争吧。

因此，从某种真正的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的全面战争有些偶然性。既没有这种意图也没有这种谋划。但科学技术、被煽动起来的公众情绪以及历史的偶然因素等共同作用，却使全面战争看似不可避免，并终于如期而至。

同样，我们也看到了对大国来说，把军事占领作为一种合理和可行的战争目标，也已成为过去。当年，德国对“生存空间”的追求和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渴望，显然是受到三四十年代为急剧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与稀有原料的需要所驱使。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两种需求对发达国家的福祉已扯不上多大干系。

与流行的神话恰恰相反，发生在朝鲜和越南的冲突才构成了未来战争的模式，虽然它们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我们在黎巴嫩、格林纳达、巴拿马、海地、伊拉克北部和巴尔干半岛进行的有限军事行动，都是出于有限目的。“沙漠风暴行动”（海湾战争）完全是一

场为了有限目的而进行的有限战争。伊拉克夺取科威特是一种占领行动，但这种占领未能持久化，因此，也就不成其为未来战争的一种样式。虽然如此，国际社会虽然因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动员起来，却不会支持完全打垮伊拉克。如果美军将伊拉克军队彻底摧毁，夺取伊拉克全境，让其国民屈服，占领巴格达，并审判和处决萨达姆·侯赛因，其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也许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吧。正因为如此，美国便没有这么做。

但在不对称冲突中，上述这些宽泛的概括却未必适用。当弱国与强国交战时，对于它来说，这就是全面战争。内战也是如此：因为冲突双方系围绕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根本属性而展开争夺，所以往往就是“全面战争”，虽然它与国际冲突存在着很大差异。

排他性意识形态的消亡

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完结。

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安全构成的所谓威胁，已有许多论者加以阐述。但是，那些对此感到担忧的人们，其看问题的视角并不正确。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其实是一种文化失败的象征。自五百年前伊斯兰文明从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以来，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着。伊斯兰主义，或政治化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对稳定的地区性威胁，原因在于它往往是民众对中东和南亚地区政府软弱、腐败和低效率的一种普遍的反应。

反共产主义作为冷战期间西方对苏联和其它国家共产主义影响作出的一种反应，究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只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应，而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现在实际上已经灭亡了。无论从何种实际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和民主都不是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内涵，人们迄今尚未作出严格的定义。民主是一种统治理论，而资本主义则是对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并不严谨的称谓。民主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和发展，在不同的国家环境里有不同的

运用，而资本主义正发展进入到我们现在只能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的阶段。

对意识形态之未来抱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作者接受了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论点。毫无疑问，我们会看到在对现代化和“西化”的影响作出回应的过程中，会兴起各种平庸的“主义”和个人崇拜。此外，还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尽管任何一种极权主义都将构成一种挑战，但是否会有哪一种会被人们广泛接受，现在还是一个疑问。

大联盟的终结

恰恰是因为针对发达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巨大军事威胁已不复存在，加之敌对性的排他性意识形态已陷于失败，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大联盟是否还有过去那种必要性，便构成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主大国虽然曾在短暂的 20 世纪里联合起来以抵御共同的威胁，但在这种突出威胁已经消失的形势下，国际关系有可能因为一些不那么重要、更容易控制的一些政策考虑而发生变化。一方面，大西洋同盟和欧洲联盟仍将得到维持，这主要是为了整合前华约成员国，使之加入到国际社会政治与经济主流——欧洲和现代国家共同体中来。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威胁已烟消云散，北约组织的性质也将随之变化，趋于松散化。联合国和各种地区性组织作为政治论坛，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无论是大国、中等国家还是小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会发生一些较次要的对抗，在行为上表现出差异，但都会遵守较为宽泛意义上的约束。比如，加拿大和欧洲未必赞成美国的古巴政策，但美国出于自身需要而坚持这样做的时候，却不需要担心这会损害它与加拿大、欧洲的核心关系。又比如，法国可能执意要求在北约军事体系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却遭到婉言谢绝，其原因就在于它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小。欧洲国家也许偶尔在相互关系

上出点麻烦，但却不必担心其广泛的共同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美日关系也是同样。就贸易规则发生的争执和文化上的误解，一般都能在更为重要的合作与相互利益的框架内得以调解。

北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成立的。究其目的，用伊斯梅爵士的话说就是，“拉住美国，赶走俄国，制服德国。”现在，俄国人事实上已被邀请进来，德国也已再度成为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北约今后惟一的真正意义是不要让北美人抽身而去，并为东欧国家的重新整合提供一个机制。但如果美国就像它在 1997 年北约成员国扩大问题上所做的那样继续无视欧洲成员国的考虑，美国要想保持其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未尝便能一劳永逸。

美国因其巨大的财富和军事影响力，在许多方面仍将维持其天然的国际领导地位，但联盟关系将会松散，对某些特定问题的反应也会有变化。究其结果，联盟的领导地位和主从关系将比以往更成问题。当某种政策利益和观点发生分歧时，盟国和正在兴起的地区大国会比过去更无所顾忌地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同理，彼此竞争的国家对来自大国的庇护和利用一个超级大国制衡另一个的信念将趋于淡化。就此看来，“超级大国”这一特定概念的含义会比过去少一些东西，至少会有所不同。

国际体系的演变

就其本质而言，我们熟悉的国际体系自十七世纪及现代“超级国家”兴起以来，在结构和运行方式上一直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将一如既往，但虽然它可能仍是政治组织的首要形式，但将不再是惟一的形式。庞大帝国时代看来已成历史，一是由于民族主义力量，二是因为通讯和经济的全球化，将削弱庞大的多民族社会的控制力。跨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日显重要，将使各国的主权范围越来越受到制约。非国家主体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多，也将大大加深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技术将改变经济生产的性质，因而，使社会

政治实体的新形式无需领土、资源和人口就能蓬勃地发展起来。在我们这个世纪曾作为冲突之因的排他性意识形态的消亡，也意味着曾建构了国际秩序的大联盟的意义将趋减少，从而导致联盟结构及其性质可能更具可塑性和多变性。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体系是由美苏关系的两极构筑的。在冷战后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秩序有力地排除了建立一极体系的可能性。国际体系的演变将是走向多极，其结果，“超级大国”概念的含义将减少，这将要求对“大国”定义作某种重新界定。

联合国成立伊始，即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从根本上主宰。苏联崩溃意味着它的继承者俄罗斯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因此，关于再增加五个常任理事国以扩大安理会，从而有效地淡化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权力和影响的酝酿，已持续多年，至于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也将再增加四个以供轮换。有论者建议，新增设常任理事国不享有现有常任理事国所拥有的否决权。但不管怎样，地区大国藉安理会理事国席位而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央，其影响将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这些现象与影响的最终结果，将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国际体系的应运而生。国际关系行为不能简单地就是国家间的行为，正像过去的 350 年里所主要表现的那样。在一个企业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并不能武断地认定企业一定会对国家保持忠诚。日益增长的次国家集团将要求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对其权益的承认。通讯技术将比过去更加畅通无阻地渗透到各国内部。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扩散的时代，力量均衡概念还有多大的适用性，这个问题尚待解答。当然，追求平衡将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多中心的过程。

无论是超国家、次国家还是日益增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舞台上这些相对较新的行为主体，其特征是各不相同的。正像一位

评论家最近指出的那样，这一“权力的转移”未必就是一种零和游戏，更确切地说，“非国家行为者获得的权力不必理解为国家权力的损失……国家没有在消亡，而是分散到它各个功能明确的部分。”正在演变的不是常令人恐惧的全球性政府，而是全球化的统治，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经济发展至上

在超国家一体化力量、次国家分离势力的共同影响下，传统的国际政治正在遭到削弱或重塑，传统的国家常备军事力量的使用方式不再是国家力量运用的主要方式。在国际体系中，经济活动日益主导国际舞台。就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间的竞争而言，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假设主要商业企业的全球化性质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形也未必导致主要竞争者之间的零和游戏。超越市场途径的贸易战的出现，也未必是新的国际机制的必然结果，近期的美 - 日贸易谈判和拉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两个例证。事实上，有一个学派坚持国家间的竞争不是经济上的，而企业间竞争则是。要理解这一概念需要改变分析的层次。

冷战时期，已显现广阔前景的国际经济体系为三个主要经济圈：北美经济圈、北欧经济圈和环西太平洋经济圈。这种分析实质上是对全球经济难以置信的互动与一体化没有正确认识。随着智利和其它国家的逐渐加入，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一体化前景广阔。欧盟同样将向东扩展。“新的亚洲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无论近期受到怎样的打击，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改变西太平洋经济圈的面貌与现状。北美经济对大西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都是重要的，所有这些地区经济的相互依存将日益增强。

尽管苏联曾几何时在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但在走向崩溃后，它的继承国在本质上已沦为经济上的第

三世界国家。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只要俄罗斯众多的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潜力引人注目，但还仅限于一个经济市场的作用，中国并不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当然，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完全的现代化，其潜力可能相当可观，但如果据此对其不断上升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作出过度宣传，至少是不真诚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

现代化与传统主义

在今后一个时代，紧张与潜在冲突的最大根源很可能是那种不容讨价还价的压力引起的。压力来自什么，很难找到贴切的词汇来表述，这里姑且称之为现代化。“现代”是建立在哲学和思想方式基础上，以科技为显著标记的，其传播的途径是经济交往，其影响体现在文化和社会领域，因而也包括政治。历史地说，现代化的地区是西方（至少自十五世纪以来），如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在日本和西方的扩张地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已深深扎根，并很有可能带着不同的地方特色在环太平洋圈、中欧和东欧、拉美，也许还有南非继续繁荣兴盛。

这种推论有些线性化，而其进程却要复杂得多。从文化、社会和政治思潮的意义上说，现代化进程是循环的，既允许和激励哲学上的和科学上的思考与技术上的创新，也承认和鼓励相反的思潮。自中世纪结束以来，西方文化已培养和鼓励了这种发展，因此，其进程已得到了不懈的加强。

自那时起，除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 1945 年以来的日本，没有其它文化这样做，至少没有以这样的速度与广度。因此，我们可能看到导致重大冲突的错误方面不是如塞缪尔·亨廷顿所预期的“文明的冲突”，而是先进的“文明”与那些抵抗普遍发展趋势的地区、人民及其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正如拉尔夫·彼得斯所概括的：“未来战争与暴力冲突的产生将是政府的无能及整个文化

的衰败，前者体现在资源配置与控制的有效体系的作用面前，后者体现在后现代化时代的竞争中。”

这种情形未必比亨廷顿所说的混乱要少，事实上，可能会更多，因为冲突往往会体现在各个社会的内部，可能这种情形较之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要更频繁。这种斗争将不是发生在横向的文明之间，而是纵向地发生。彼得斯所认为的各种分崩离析的现象（财富的两极化、社会分裂、反政府情绪、有效运用与创新能力低下等），将实实在在地检验所有的文明。

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

当今世界在人口方面正发生着几个重要变化，在其共同作用下，将对未来战略格局的性质产生影响。大约自 1880 年以来，世界总人口一直平稳增长，1950 年前后，增长开始加快，这已引起许多观察家的关注。但人口方面的其它特征将更为突出。世界确实在进入老龄化，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而在许多经济更为落后的地区则出现了“婴儿潮”现象。经济的滑坡和环境的恶化（这二者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及内部冲突，正促使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和迁徙。同时，全球性的城市化正前所未有地发展。所有这些趋势激烈地相互作用，其中一些趋势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一个社会的一定人口、人口结构与健康特征，既有助于确保合理的福利体系，也会导致其走向反面。比如，在经济发达的社会里，高标准的基本卫生、营养条件及医疗保障体系有助于保证健康与丰饶的社会。更为健康的人口带来更为有效的经济发展。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地区的情形则相当不同。俄国的出生率非常低，而死亡率却在上升，社会认同、医疗体系和生态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欠发达地区，正通过改善基本卫生条件、计划生育、加强基础建设、提高妇女文化等措施水平降低出生率。但后者造成的两种影响在许多社会里经常与传统和宗教格格不入，从而加剧了社会与

政治的不稳定。然而，在十五岁以下人口占多数的许多地方，人口结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出现。

文化与社会在某些程度上总是相融合的，特别是在西方。人口结构与人口趋势，往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文化与社会的变化，但有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巨大，也会对文化和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这种变化最显著的根源是会受移民的鼓动，特别是如果新来的移民与当地人口在种族、宗教和社会习俗方面迥然不同。然而，对大多数经济发达的社会来说——当然，日本不在其例——其人口结构的改善仍是通过移民。

移民模式显然是单向的。无论是经济类、政治类移民，还是难民——假如有可能的话——都是从穷国迁居到富国。这种现象对接收国来说有利有弊，而对输出国来说则是徒见其弊不见其利。移民输出国不断流失人才，从而失去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知识的活力与社会潜力。这种现象是一种零和游戏：彼方之“人才流出”即己方之“人才获得”。这种人口流动还有很多潜在的麻烦。对具有民族同化历史的传统移民国家来说，当前的人口流动只是其二、三百年移民进程中最近的一个阶段。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带来诸多困难，但仍是可消化的。在欧洲，移民的潜在影响更加重大，因为在现代化时期，它们尚未成其为移民社会。

在其它方面，城市化进程也导致了文化与社会变迁。不仅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因为其庞大的数量而改变着城市，更重要的是，城市也改变了这些移民。乡村生活往往完全是个体交往：与大家庭，与村镇，与四季交替播种的土地。城市工作则不同，生活的个人化淡化了许多，也丰富得多。时间变得更为随意，但也更为重要。城市化进程总会带来损害。缺乏正常的人际帮助机制，有成就——或没有成就——都变得更为个人化。在北欧和北美，城市化进程与巨大的工业和经济增长同步，这并非总是令人愉悦。今天，在拉美、

非洲和其它地方，城市的空前的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称。因而，新的城市居民的正常压力将因住房、教育、社会服务、卫生设施和净水的需求而大大加剧。这些社会很少在经济上为提供这些需求做好了准备。乡村“共产主义者”和农民暴动的威胁——想象中的和现实中的——已大大消散。大多数情况是政治衰退并催生频频制造麻烦的抢劫活动。未来，稳定会不会受到政治主张明确的城市暴动的威胁尚不可知，因为不满的根本原因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将因为人口与城市的过度增长而加剧。

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

无处不在的现代通讯系统将增加人们及其政治体系的联系，其结果是使之成为转化或加剧这些紧张状态的工具。

自19世纪以来，这一进程从未间断，并加速进行着。首先，是快速航行的船只率先将世界市场联为一体；然后，是蒸汽机和电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国际交往；无线电报和随后的卫星通讯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走向全球“一线牵”，这在几十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长达 3000 英里的边界线长期以来已不设防，在 175 年里，这曾是举世无双和非同寻常的事。现在，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边界也有半个世纪不设防了，这对曾经 75 年里打了三次残酷的“现代”战争的两国来说，更具有历史意义，更是不同寻常。今天，整个西欧对旅游者和货物来说已没有什么过境手续。其结果是加强了这些国家间的社会融合，从而减少了未来在相互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未来，因特网、万维网和蜂窝通讯将扩大这一进程，其结果和意义或许今天尚不能清晰理解，但国际边界与时空日益模糊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诚如美国陆军战略问题研究所的史蒂文·梅茨所指出的那样：

“最终，相互交往导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政治上的联合与文

化上的融合。即使达不到融合程度，对大多数社会来说，相互交往已对几乎每一个生活领域产生了影响，并可能在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

当今时代，自给自足已完全做不到了。当领土与可采资源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当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增长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全方位的领域的竞争战略就让位于合作战略。边界与其它自我限定的观念显然变得更加有悖于生产的发展。这种情形导致有人称之为“实质国家”的出现。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发现，在后现代化时代，他们必须日益主动地提出和鼓励建立法律与安全领域的相互深入的合作制度，以便偃止冲突，有效利用相互交往带来的显著好处。

永不停步的技术革命

技术革命总是不断地破旧立新。从 18 世纪后期工业时代的破晓开始，至 20 世纪中叶，技术发展是戏剧性的，但也是公正合理的。像蒸汽循环这样的无意发明，从抽水、采矿到新的交通运输模式，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真正发挥作用。内燃机车花了 30 年才对交通运输产生根本性影响，并使之在全社会发挥作用。有人驾驶飞机花了近 40 年才改变战争样式，又用了 15 年才对民用交通产生革命性影响。最终，是机器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括农业在内的先前出现的所有生产方式。

诚然，我们这个时代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计算机和硅片。计算机被社会认识花了 60 年，现在认为，信息时代始于约七十年代，而计算机与硅片真正对个人、国家和国际的日常生活发挥如此广泛的根本性影响，只是近十年的事。商业的性质已经改变并将在今后的岁月里发生更大的变化。现在，知识和信息正被作为最重要的市场化的“商品”来认识。通讯能力已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或许其全部的意义还未被完全了解。冲突的性质，或许还有区域肯定也要变化，也许会像 40 年代那样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以致更甚。在能

源的来源和工业生产的方式上也存在着发生根本性剧变的可能。

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已适应了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相关变化的影响和意义。当今，这种变化仍在继续。这种现象对更为先进的国家和社会及其它们“早先的适应者”形成挑战：它打击和迷惑了准备不足和适应性较差的个人、经济和国家。这一持续不断的变化进程将加剧现代与传统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冲突。

变化的加速

另一个将决定未来的特点并使我们更加难以理解未来战略格局的因素，不是业已出现的变化，而是这种变化将更加迅猛。正像过去十年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战略格局发生变动的速度可能相当迅疾。八十年代后期，东欧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乱经过迅速升级，酿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该地区的共产党政权一个个垮台了，并导致了华沙条约组织的寿终正寝。在苏联，一次笨拙的未遂政变，迅速导致了世界超级大国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帝国——的分崩离析。事实上，这些重大事件是多年孕育的结果，但其发生的突然性改变了战略平衡——并据此改变了战略格局——这种改变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十年后，北约至少要从其先前的对手华约中吸收三个成员。

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创新与进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时间越来越短。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跨越了 125 年，大约从十八世纪中叶到 1880 年前后；此后的生产力革命只用了前者的一半时间，大致从 1880 年到 1940 年；接着的管理革命，从 1940 年大约到 1975 年。推动和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信息技术令人难以置信地迅猛发展。“摩尔定律”认为，计算机程序处理能力每 18 至 24 个月就要翻一番，而与此同时，计算机成本下降一半。自 1970 年以来，一直如此。在这一进程中，计算机所触及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且往往是难以预料的。

技术进步并不总是直线型的。比如，经济发达的国家使用了有线通讯设施，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一跃进入无线通讯，因而一步跃过了光纤通讯这个中间阶段。这样，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至少可以跨越欧洲和北美上个世纪曾经历的艰难的工业化时期。同样的跨跃式发展也将发生在军事领域。

技术变化还有一个有意义的特征，类似于火焰在烧尽之前最明亮。历史地看，似乎任何一代技术及其体系在其普及完善达到生产力的顶峰时，也就是被另一种其它技术逐步取代之前。大约在十二世纪开始的创新出现的披甲骑士，到了十六世纪初，他实际上是一个高贵的摆设。但粗劣的火器的出现使这种骑士很快成了废物。同样，蒸汽动力船只发明之际，也就是快帆船达到效益顶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商业之时。铁路系统的顶峰时期也就是商业航空与公路系统出现之时。喷气式飞机跨大西洋定期航班的出现比开创太空时代的第一次卫星发射早了一年。这里，实践上和哲学上的教训或许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不应该太依恋我们处事的方式。

战略启示

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将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外交政策考虑的改变，是因为安全需求的变化。联盟结构的真实可靠不再是一成不变，因为联盟的性质和意图会改变，反过来，这预示着威胁也会改变。临时性联盟将更为常见。国家将与之打交道的不仅仅是国家，还包括无数的超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实体。传统力量的经济基础正在改变，因为创造财富的本质在改变。世界在各个方面正变得更为相互依赖。

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实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削弱了民族国家